

20世纪

黄晓华 著

中国小说修辞史略

小说修辞张力结构横轴与纵轴轴的各个要素
都会随时代的变化
而改变 从而使小说修辞表现出鲜明的历时性特征。



人民
文学
出版社

20世纪

黄晓华 著

中国小说修辞史略



人
民
出
版
社

责任编辑:洪 琼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20 世纪中国小说修辞史略/黄晓华 著. —北京:人民出版社,2014.4

ISBN 978-7-01-013491-8

I. ①2… II. ①黄… III. ①小说-修辞学-文学研究-中国-20 世纪

IV. ①I207.4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4)第 084626 号



20 世纪中国小说修辞史略

20SHIJI ZHONGGUO XIAOSHUO XIUCI SHILÜE

黄晓华 著

人民出版社 出版发行

(100706 北京市东城区隆福寺街 99 号)

环球印刷(北京)有限公司印刷 新华书店经销

2014 年 4 月第 1 版 2014 年 4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

开本:710 毫米×1000 毫米 1/16 印张:18.5

字数:300 千字 印数:0,001-2,000 册

ISBN 978-7-01-013491-8 定价:49.00 元

邮购地址 100706 北京市东城区隆福寺街 99 号

人民东方图书销售中心 电话 (010)65250042 65289539

版权所有·侵权必究

凡购买本社图书,如有印制质量问题,我社负责调换。

服务热线:(010)65250042

序

晓华是湖北大学文学学院的青年教师,在武汉大学现当代文学专业博士毕业后到华中师范大学做博士后,我是他的合作导师。晓华是一个很有科研潜质的人,他勤奋,思路清晰,能抓住问题并有自己的见地,文笔也不错。晓华一直关注小说修辞问题,已发表数篇颇有质量的论文,并以20世纪中国小说修辞为研究对象撰写了博士后出站报告。最近他从美国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访学归来,拿出这部《20世纪中国小说修辞史略》书稿,嘱我写序,我虽然有点忙,但欣然应允。平日里我最高兴的事就是看到学生有新成果,取得新进步,并常常以此为荣,跟同事晒幸福感。

晓华研究的小说修辞,其理论来源为修辞学和叙事学。我们知道,修辞学是一门古老的学科,亚里斯多德就专门写过一本《修辞学》的书;而经典叙事学则产生于20世纪60年代的法国。饶有兴味的是,古老的修辞学走进了现代叙事学,竟然两者相得益彰。以詹姆斯·费伦为代表的修辞叙事理论将修辞引入叙事学,从交流和效果的层面弥补了叙事学的局限,已成为后经典叙事学的重要流派之一。晓华在参照西人理论成果的基础上又作了新的开拓,不仅提出了特定的小说修辞理论框架,而且将观照对象转向20世纪的中国小说,关注中国小说的修辞演变,从而在理论和实践两方面推进了具有中国特色的小说修辞理论的建设。

该书稿的特色首先体现在小说修辞的理论建构上。晓华的这个理论模型既宏大又不失具体,他借鉴了叙事学的内在结构,其要素不仅含有隐含作者—叙述者—人物—受述者—隐含读者—读者这一横向轴,而且包括故事—叙事—叙述这一纵向轴,他的小说修辞要求从纵横两轴把握各要素之间的内在关系。而这还不是他的理论模型的全部,除文本内部的各种关

系外,晓华还扩展到文本外部的诸因素,即世界—作者—文本—读者这些要素以及它们之间的关系,并指出这四者之间存在张力与互动。显然,晓华试图建构的是一种兼顾文学内部研究和外部研究的综合性小说修辞体系,这一理论框架为整体考察 20 世纪中国小说提供了新的思路。

其次,也是该书稿最突出的特色即贯穿全书的历史意识。这种历史意识既体现为理论建构的动态性上,又体现在对 20 世纪中国小说修辞的历史脉络的勾勒上。晓华不仅把小说修辞理论视为一个复杂的系统,而且特别强调这个系统各要素会随着时代的发展而改变,由此形成小说修辞的动态系统。而这个动态系统又与特定的语境密切相关,小说修辞系统的运作是在一定历史语境中进行的,甚至可以说,没有语境的参照就无所谓修辞。因此,立足于特定语境,关注时代与小说修辞之间的关系,发现时代变更与小说修辞新质的内在联系,就成为探讨 20 世纪中国小说修辞演变的基点。该书稿的历史意识更多地展现在对 20 世纪中国小说修辞演变脉络的宏观把握和具体分析上。整个书稿具有明晰的历史线索,作者将 20 世纪以来的中国小说修辞划分为四个阶段,并通过阐释小说修辞各要素的变化,具体描述和提炼了不同阶段的小说在修辞语境、修辞契约、修辞策略以及修辞认同等方面的历时性特征,揭示中国小说修辞演变的内在动力与发展规律,由此揭开了 20 世纪中国小说史的又一层面。

最后,该书稿在文本分析上的可操作性可视为对文学批评的贡献。该理论框架不仅提供了把握 20 世纪中国小说修辞的宏观角度,而且为读者从微观上解读小说作品提供了路径。晓华在博士阶段是学现代文学的,对文学史材料很熟,这一学术背景也给他研究小说修辞提供了便利。在书稿中,作者运用所建构的小说修辞理论,对 20 世纪中国的一些代表性小说文本做了条分缕析的分析,提供了一种修辞解读的批评实践。不仅如此,晓华还借助现代中国小说“立什么人”与“如何立人”这一话题,从小说“讲什么”和“怎么讲”的背后,探讨“为什么讲”以及“为什么这么讲”的问题,将批评伸向小说的意义世界,从而使小说修辞批评成为既理解小说艺术价值又把握小说思想价值的通道。也正是有了这种综合的修辞角度,使晓华在

中国近现代小说修辞的研究上有了新的体悟,获得一些有价值的结论。基此,晓华在小说修辞方面不仅做了一次形式与意义融合的尝试,而且作了一次打通文学理论、文学史与文学批评学科壁垒的尝试。

应该说,建构如此复杂的小说修辞理论和对云谲波诡的 20 世纪中国小说修辞的梳理已实属不易,若从更高的要求看,这部手稿还有一些待完善之处。例如小说修辞中有些概念的命名以及相关概念的内在关系需要进一步厘清,20 世纪中国小说修辞演变分期的定位以及对这些分期的历史语境的某些阐释也还需要斟酌。中国的小说修辞理论毕竟处于探索之中,学无中西,但创有中西,相信晓华在未来的研究中将会写出更贴近中国小说实际、引领中国小说修辞理论并能够与西方展开对话的更具创造性的力作。

胡亚敏

2014 年 2 月 8 日于华大家园

目 录

序	胡亚敏 1
导 言	1
第一章 小说修辞的动态系统	11
第一节 没有语境参考的修辞根本无法判断	14
一、修辞情景	15
二、修辞受众	18
三、修辞话题	18
第二节 小说修辞动态体系的横向轴	19
一、人物—人物:个性的碰撞	19
二、叙述者—受述者:距离的调节	21
三、隐含作者—隐含读者:权威的形成	25
四、作者—读者:友谊的建立	27
第三节 小说修辞动态系统的纵向轴	31
一、故事—选择:经验—欲望	32
二、叙事—表达:讲述—展示	36
三、叙述—阐释:判断—评价	43
第四节 小说修辞的认同模式	47
一、认同维度	48
二、认同方式	57
第二章 中国小说修辞的历史视域	61
第一节 修辞语境的历史性	61

一、修辞情景的历史性·····	62
二、修辞受众的历史性·····	64
三、修辞话题的历史性·····	67
第二节 修辞契约的历史性·····	69
一、叙述语言的历史性·····	70
二、叙述权威的历史性·····	71
三、叙述距离的历史性·····	74
第三节 修辞策略的历史性·····	80
一、故事—世界:真实—虚构关系的历史性·····	80
二、叙事—文本:展示—讲述关系的历史性·····	83
三、叙述—意义:现实—理想关系的历史性·····	88
第四节 修辞认同的历史性·····	89
一、认同排序的历史性·····	90
二、认同方式的历史性·····	95
第五节 修辞类型的历史性·····	97
一、传统—阐释型修辞·····	97
二、现代—建构型修辞·····	98
三、后现代—解构型修辞·····	100
第三章 现代修辞的萌生(1895—1917)·····	102
第一节 修辞语境的近代化·····	104
一、修辞情景的近代化·····	104
二、修辞受众的近代化·····	109
三、修辞话题的含混性·····	113
第二节 修辞契约的过渡性·····	120
一、叙述语言:白话与文言的反复·····	121
二、叙述声音:代言与立言的两难·····	123
三、叙述距离:启蒙与审美的分裂·····	125
第三节 修辞策略的过渡性·····	126
一、故事建构:实录与空想的分化·····	127

二、叙事技巧:讲述与展示的杂糅	129
三、意义阐释:现实与理想的割裂	130
第四节 修辞认同的过渡性	131
一、认同维度的单一性	132
二、认同方式的残缺性	134
第四章 现代修辞的确立(1918—1949)	137
第一节 修辞语境的现代化	137
一、现代视野中的修辞情景	138
二、现代教育下的受众群体	141
三、现代话语中的修辞话题	144
第二节 修辞契约的现代化	147
一、叙述语言:工具与审美的对立统一	147
二、叙述声音:立言与言志的和谐互动	150
三、叙述距离:价值与情趣的双重改造	152
第三节 修辞策略的现代化	154
一、故事建构:写实与虚构的统一	155
二、叙事技巧:讲述与展示的协奏	157
三、意义阐释:现实与理想的互动	160
第四节 修辞认同的现代化	161
一、认同维度的立体性	162
二、认同方式的协商性	164
第五章 现代修辞的转向(1949—1976)	168
第一节 修辞语境的一元化	168
一、规约化的修辞情景	168
二、理想化的受众群体	170
三、革命化的修辞话题	173
第二节 叙述契约的政治化	175
一、叙述语言:语言与政治的结盟	176

二、叙述声音:代言与威权的共振	178
三、叙述距离:认知与审美的对峙	179
第三节 修辞策略的政治化	181
一、故事建构:典型与写实的分裂	181
二、叙事技巧:讲述与展示的失衡	182
三、意义阐释:理想与现实的错位	184
第四节 修辞认同的政治化	185
一、认同维度的政治化	186
二、认同方式的碎裂化	188
第六章 现代修辞的分化(1977—)	191
第一节 修辞语境的多元化	191
一、多元视野中的修辞情景	191
二、多元背景的受众群体	194
三、多元取向的修辞话题	197
第二节 叙述契约的多元化	200
一、叙述语言的分化	201
二、叙述权威的分化	204
三、叙述距离的分化	205
第三节 修辞策略的多元化	206
一、故事建构:典型论的坚守与解构	206
二、叙事技巧:展示的凸显与讲述的变异	208
三、意义阐释:规律论的坚守与解构	208
第四节 修辞认同的多元化	209
一、认同排序的多元化	210
二、认同方式的多元化	211
结语 修辞视角与 20 世纪中国小说“立人”命题的展开	214
一、修辞语境与“立人”空间的开拓	214
二、修辞目的与“立人”内涵的深化	215

三、修辞交流与“立人”命题的实现	217
附录 20 世纪中国小说修辞的散点透视	219
一、被压抑的“后现代性”——晚清翻译小说的解构修辞与 中国小说的现代转型	219
二、身体、文化、修辞与“狂人”的生成建构	233
三、中国现代癫狂叙事的修辞策略与认同困境	241
四、先锋叙述与身体启蒙——论《现实一种》的身体修辞	256
五、隐喻·换喻·提喻——论中国当代情爱叙事的身体修辞	264
参考文献	278
后 记	283

导 言

一、研究现状与选题依据

亚里斯多德认为,“修辞术的定义可以这样下:一种能在任何一个问题上找出可能的说服方式的功能。”^①这一定义奠定了西方修辞学的传统,包含着多重意味。首先,修辞具有一种能够使对方改变自己态度的力量,修辞的目的就是为了使对方被“说服”。其次,修辞目的的实现主要以话语活动为媒介,是通过“说”话的方式来使对方“服”从,使其改变自己的态度,而不是通过暴力等其他手段对对方产生影响。这与福柯所说的话语权力或权力话语存在差异,修辞侧重于话语活动本身,而话语权力则侧重话语活动与更广大的社会权力之间的关系。虽然修辞与话语权力以及社会权力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但在修辞性话语活动中,双方相对比较平等,话语的运用始终相对和平。修辞受众是否改变其态度,一定程度上取决于自身的“自由”判断。最后,修辞不仅包括言语行为,也包括非言语行为。亚里斯多德所说的“品质”、“情感”与“理性”三诉诸,并不能完全包括在言语行为之中。这些非言语因素,对修辞效果会产生巨大影响。同时,修辞中依旧隐含着话语权力,与更广大的社会权力联系在一起。

然而,亚里斯多德的这一定义存在着重大局限,那就是过于强调了修辞的“说服”功能。“说服”意味着受众是“被说服”的对象,修辞主体与修辞受众之间的关系是单向度的,二者地位并不对等,受众的主体性没有受到足够的尊

^① 亚里斯多德:《修辞学》,罗念生译,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1年版(下同),第24页。

重。正因为传统修辞学的这一局限,肯尼斯·博克^①在《动机语法》(*A Grammar of Motives*, 1945)与《动机修辞学》(*A Rhetoric of Motives*, 1950)中提出“认同”理论,强调修辞行为的双向性。肯尼斯·博克把修辞(rhetoric)定义为“人类主体为着对其他人类主体形成态度或诱发行为而使用语言”。^②在《动机语法》中,博克明确指出,认同是修辞的归宿,也是修辞的手段:“修辞者可能必须在某一方面改变受众的意义,然而这只有在他和受众的其他意见保持一致时才办得到。遵从他们的许多意见为修辞者提供了一个支点,使得他可以撬动受众的另外一些意见。”^③也就是说,说服(让受众认同自己的观点)必须以修辞主体认同修辞受众的某些观点为前提。同时,他的“戏剧模式”也强化了亚理斯多德关于非言语因素在修辞中的重要性。他提出的“戏剧五元模式”这一“结构隐喻”:行动(act)、情势(scene)、施事者(agent)、手段(agency)、目的(purpose),强调了修辞效果的实现与这一戏剧结构的内在关联。同时,博克借鉴吸收了弗洛伊德精神分析的成就,将修辞研究的疆域拓展到了无意识领域,不仅指出了修辞主体可能存在下意识的修辞目的,而且受众同样可能出现无意识认同。这极大地拓展与完善了修辞理论。

在以肯尼斯·博克为代表的美国“新修辞学”兴起的浪潮中,W.C.布斯顺势提出“小说修辞学”,深入系统地研究了小说作为一种修辞的特征与规律。虽然从修辞学诞生开始,文学与修辞之间的关系就一直是人们关注的重要问题之一,修辞学的发展与文学的发展相互影响。然而,这些研究大多以文学作品为研究对象,主要关注文学作品的风格以及修辞格,很少将文学视为一种实现作者与读者之间相互认同的修辞行为。这一倾向使得文学的内部研究与外部研究相互脱节。

布斯《小说修辞学》(1961)这一小说修辞研究里程碑式的作品,不仅明确指出了小说修辞的目的性,而且系统分析了小说作者如何实现与读者相互认同的技巧与方式。他对小说修辞伦理效果的强调,对交流过程中各个修辞要

① 关于肯尼斯·博克(Kenneth Burke)的名字的翻译,现在国内还没有统一,也有译为肯尼斯·伯克的。为表达便利,本书统一使用肯尼斯·博克。

② 转引自王一川:《兴辞诗学片语》,山东友谊出版社2005年版(下同),第112页。

③ 肯尼斯·博克:《动机语法》,第56页,转引自刘亚猛:《西方修辞学史》,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2008年版(下同),第346页。

素之间各类距离的划分,以及如何实现最终相互认同的阐述,确立了小说修辞分析的基本框架。他认为,小说修辞的较高境界就是作者与读者在小说开始时各方面的距离很大,而到结尾时则实现二者在多个层面上的同一。这种同一的实现,就是小说修辞技巧要实现的任务。

在由托多洛夫(1969)命名并以热奈特的《叙事话语》(1972)等著作为代表的经典叙事学兴起以后,小说叙事学与小说修辞学相互借鉴,最终交融成修辞性叙事学,成为后经典叙事学的重要流派。这些研究在与布斯进行对话的过程中,推进了小说修辞研究的发展。

西蒙·查特曼的《叙事术语评论:小说和电影的叙事修辞学》(1990)将读者反应批评、文化研究的某些方法融入叙事研究,认为小说叙事中存在两种修辞:劝说读者接受其形式的修辞与劝说读者接受其主题的修辞,亦即美学修辞与意识形态修辞。不过,他同时指出,小说的一个叙述技巧可同时服务于审美修辞与意识形态修辞。这种审美与意识形态的区分,可以见出小说修辞的不同维度。查特曼虽然指出了这两种修辞,但并没有对这两种修辞进行深入系统的分析,也未曾明确区分二者之间的层次性及相互关系。迈克尔·卡恩斯的《修辞性叙事学》(1999)则强调了语境在小说叙事中的作用。

作为修辞性叙事理论的代表人物,詹姆斯·费伦借鉴了叙事学的一些区分方法来建构理论模式,对小说修辞交流的各个层面都进行了独创性的研究,极大地推进了小说修辞理论的发展。在《解读人物,解读情节》(1989)中,费伦重点探讨了文本层面,提出了多维度人物观以及动态情节观;在《作为修辞的叙事》(1996)中,他发展了自己的理论框架,更为关注作者代理、文本现象与读者反应之间的循环互动。在作者层面,费伦坚持了隐含作者的概念,同时丰富与发展了布斯的不可靠叙述理论;在读者方面,费伦发展了拉比诺维茨的四维度人物观。但是,在他分析这种作者—文本—读者修辞互动的复杂关系时,对作者进行修辞选择的的目的性以及读者的价值判断却有所忽略。这些问题在他的新著《体验小说:判断、进程及修辞性叙事理论》(2007)得到了较为深入探讨。通过对阐释判断、伦理判断与审美判断三类叙事判断的区分及其相互影响的论述,费伦更为明确深入地分析了隐含作者与隐含读者之间的修辞互动的结构。在该著中,费伦认为在小说阅读接受中,读者的阐释判断、伦理判断与审美判断三种主要的叙事判断对于理解小说的叙事伦理、叙事形式

和叙事审美三个方面至关重要;同时,读者的阐释判断、伦理判断、审美判断相互影响。费伦的所有这些论述,实际上都指向了小说修辞的层次性、系统性与多维性,隐含着对小说修辞认同结构的理解与论述。但费伦的理论中也存在一些需要澄清与完善的地方。他谈到读者的审美判断时,未曾涉及语体等重要的审美问题;对作者、人物、读者之间的情感互动与认同的作用没有进行系统论述;侧重读者的修辞反应,而对作者的目的,对小说意识形态性的关注没有贯穿始终。

海外小说叙事学研究与修辞研究对国内小说理论研究产生了较大影响,但国内专家并非跟在外国人之后亦步亦趋,而是从多个方面丰富与发展了小说叙事学与小说修辞研究。胡亚敏《叙事学》(1994)单列一章专谈“阅读”,探讨小说叙事中读者的地位与作用,一定程度突破了结构主义叙事学的局限。杨义的《中国叙事学》(1997)凸显了中国小说叙事的民族性,其中也涉及了中国小说叙事的时代性。王一川的《修辞论美学》(1997)运用修辞视角阐释文学理论与文艺现象,对小说修辞研究也有重要启示意义。尤其是他在《兴辞诗学片语》(2005)中,结合肯尼斯·博克的认同理论与马斯洛的需求层级理论,勾勒出文学中的八类认同模式,对于小说修辞认同研究有着重要的启发作用。耿占春的《叙事美学》(2002)探讨一种“叙述形式的社会学”,关注与分析了修辞情景对于小说叙事形式的制约与影响。这些研究,虽然没有打出小说修辞研究的旗号,却对小说修辞研究具有多重启发与借鉴意义。

李建军的《小说修辞研究》(2003)是大陆学界第一部专题研究小说修辞的著作,在学界产生了较大反响。其对既有小说修辞理论进行了梳理与反思,为小说修辞研究提供了较具体的方法与思路。其中微观修辞与宏观修辞的区分,提高了小说修辞研究的可操作性。然而,该著对小说修辞的理解显然不够统一,尤其是将其区分为宏观修辞与微观修辞之后,对于微观修辞如何实现修辞目的则不甚关注。这显然与国内学界将修辞等同于修辞格的思维定式相关,作者将微观修辞与修辞格等同起来,因此,宏观修辞与微观修辞虽然共用了“修辞”字眼,实际上却是两个完全不同的概念:宏观修辞的修辞指的是话语交流,而微观修辞的修辞则是指修辞格,至于宏观修辞与微观修辞之间的内在联系,修辞格如何影响话语交流,则被无意识地忽略。同时,他的理论框架还是囿于小说修辞研究的结构主义思路,注重小说修辞的共时性研究,忽

视小说修辞的民族性与时代性。

尽管直到布斯才打出“小说修辞学”的旗号,但这并不意味以往的小说理论家不关心小说作者与读者通过文本进行的交流行为,相反,很多小说理论家不仅对小说修辞的动态系统进行了比较深入的研究,而且对小说修辞交流的历史演变进行了独到的探讨。巴赫金在《陀思妥耶夫斯基诗学问题》(1929, 1963)中提出的“对话理论”,极大地丰富与拓展了小说修辞的研究视野,无论是在理论建构方面,还是在研究思路方面,都极大地启发了后来者。他对独白型小说与对话型小说的区分,实际上已经隐含着对小说修辞发展的历史判断,他认为对话型小说的出现是近代以来的事情,其中已经包含着发展的眼光。弗莱《批评的解剖》(1957)从作者—人物—读者之间的相对位置,区分神话、传奇、高模仿、低模仿、讽刺(反讽),其中也隐含着一种历史眼光。布斯在写作《小说修辞学》的时候,虽然更多地关注小说修辞的共时结构,但在文本中实际上已经隐含着一种历史视角,那就是现代小说修辞与传统小说修辞之间的联系与区别。其论述重点虽然在现代修辞,却始终以传统修辞作为参照系。但他自己也承认,该著并没有勾勒出一条鲜明的历史脉络。正是这种历史意识的不明晰,招来了詹姆逊等人的批评。《小说修辞学》初版21年之后,他借再版的机会回应了詹姆逊的批评,承认了这一历史视野的必要性:“作家、读者和批评家的技巧反映了他们的时代,他们的阶级倾向,他们特殊的文化时期,包括这个时期的叙述惯例,它决定了人们对一个特定叙述类型的认可与否。”^①但布斯本人并没有在这一问题上进行更深入系统的研究,而是批评他的弗雷德里克·詹姆逊在《政治无意识——作为社会象征行为的叙事》(1981)中,将叙事与大的文化语境联系了起来,在文化研究视野下探讨小说的修辞交流问题,从宏观上把握小说修辞技巧与时代文化语境的关系。

就中国小说研究界而言,陈平原《中国小说叙事模式的转变》(1988)虽然没有专门讨论修辞交流问题,但他对中国近代小说作者与读者交流方式由说一听转为写一看,对中国小说叙事模式的重要影响,已经涉及修辞交流。明确标出小说修辞的历时研究的,是郭洪雷的《中国小说修辞模式的嬗变——

^① [美]韦恩·布斯:《小说修辞学》,付礼军译,广西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下同),第426页。

从宋元话本到五四小说》(2008)。该著将小说修辞学与中国小说史研究结合起来,较宏观地考察了从宋元话本到五四小说的文本构成与修辞情景演进的过程,对于探讨中国小说修辞发展演变规律以及中国现代小说修辞都有启发意义。然而,该书在理论视野上,试图人为割断小说修辞学与小说叙事学之间的联系,忽视小说修辞的外部情境,对小说修辞的含义及其要素的理解不够统一;在具体研究中,未对现代小说修辞进行整体观照,也未实现对小说修辞进行价值评判这一目标。这些局限妨碍了作者取得更大成就。

真正深入分析了作者与读者之间交流方式的应该是曹禧修的《鲁迅小说诗学结构引论》(2010)。该著深入分析鲁迅小说所面临的认同困境,从而将读者区分为普通读者与智性读者,勾勒出了作者与读者之间的情智潜对话的双重结构,对作者与读者如何实现相互认同的机制进行了细致而深刻的研究。但该著也存在明显的弱点,首先是将读者区分为普通读者与智性读者,忽视了小说修辞交流的有机统一性,其次,他对小说修辞的动态体系并没有系统勾勒,其个案研究也限制了作者的历史视野。

总体而言,现有的小说修辞研究从多个向度,丰富与拓展了小说修辞研究的空间,但也还存在诸多不足。

首先,对中国小说的修辞语境关注不足。任何修辞都基于一定的语境,脱离语境的修辞无法让人理解。

其次,对小说修辞交流的动态系统研究不足。费伦的研究成果应该是这方面最完善的表述,其对叙事进程与判断进程的描述,涉及了作者与读者之间修辞交流的多个层面,但他的研究中,还是忽视了文本建构这一重要层面,对作者如何通过特定的文本构建来实现他与读者在各个层面的相互认同,这一研究还比较薄弱。同时,对于小说的修辞目的的多元性也认识不足。由布斯传承下来的小说修辞研究一直强调小说修辞的伦理目的,这一标准存在一定的偏颇之处。

最后,对小说修辞的历时性与民族性研究不足。由于小说修辞语境的具体性与历史性,不同时代不同民族小说的修辞目的、修辞契约、修辞策略、修辞效果都不尽相同,必然导致小说修辞模式的变化。现有小说修辞研究,大多关注小说修辞的共时性结构,对小说修辞的历时性演变关注不足,在分析对象上也以西方小说为主体。涉及中国小说修辞演变的研究,由于对小说修辞交流